# 鲁迅

## 狂人日记

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

…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…

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，到处都是。我也知道他们的方法，我学过……可是我竟不知道我自己也在无意之中，竟然也干了这事！

…

我看见他的眼光，和从前一个害死我哥哥的狼一样……我也晓得他们一向这样做：先从亲戚下手。

…

没有吃过人的孩子，或者还有？救救孩子……

## 灯下漫笔

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。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，否则，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！

…

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，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。

…

但实际上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“人”的价格，至多不过是奴隶，到现在还如此，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，却是数见不鲜的。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，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，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。强盗来了，就属于官，当然该被杀掠；官兵既到，该是自家人了罢，但仍然要被杀掠，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。这时候，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，拿他们去做百姓，——不敢，是拿他们去做牛马，情愿自己寻草吃，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。

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，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，自然就“皇恩浩荡”了。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。举其大者，则如五胡十六国⑧的时候，黄巢⑨的时候，五代⑩时候，宋末元末时候，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，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。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，不服役纳粮的要杀，服役纳粮的也要杀，敌他的要杀，降他的也要杀：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。这时候，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，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，无论仍旧，或者新颁，总之是有一种规则，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。

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！”⑾愤言而已，决心实行的不多见。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，纷乱至极之后，就有一个较强，或较聪明，或较狡滑，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，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。厘定规则：怎样服役，怎样纳粮，怎样磕头，怎样颂圣。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。于是便“万姓胪欢”了；用成语来说，就叫作“天下太平”。

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，修史时候设些什么“汉族发祥时代”“汉族发达时代”“汉族中兴时代”的好题目，好意诚然是可感的，但措辞太绕湾子了。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——

1.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；
2.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

这一种循环，也就是“先儒”之所谓“一治一乱”⑿；那些作乱人物，从后日的“臣民”看来，是给“主子”清道辟路的，所以说：“为圣天子驱除云尔。”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，我也不了然。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，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，道学家的热心复古，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。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？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，稍富的迁进租界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，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“稳”，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。总而言之，复古的，避难的，无智愚贤不肖，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，就是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了。

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，永久满足于“古已有之”的时代么？都像复古家一样，不满于现在，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？

自然，也不满于现在的，但是，无须反顾，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。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！

## 青年必读书

　　——应《京报副刊》〔2〕的征求青年必读书

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。

附　注

但我要珍这机会，略说自己的经验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——

我看中国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

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；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

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

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

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，不是“言”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## 汉字和拉丁化

…

“不错，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，但我们的祖先，比汉字还要古，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。为汉字而牺牲我们，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？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，都能够马上回答的。”

…

## 写在《坟》后面

…

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，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，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，决不是聊且快意，或什么玩笑，愤激之辞。古人说，不读书便成愚人，那自然也不错的。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，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。现在呢，思想上且不说，便是文辞，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，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，作为变戏法的手巾，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。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，但正在复古，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…

## 偏见的经验（柯柏森）

　　我自读书以来，就很信“开卷有益”这句话是实在话，因为不论什么书，都有它的道理，有它的事实，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，所以《京副》上发表“青年必读书”的征求时，我就发生“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”的疑问，到后来细思几次，才得一个“假定”的回答，就是说：青年时代，“血气未定，经验未深”，分别是非能力，还没有充足，随随便便买书来看，恐怕引导入于迷途；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，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，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，岂不很好吗？  
  
　　因此，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“青年必读书”后，每天都要先看“青年必读书”才看“时事新闻”，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，吓得我大跳。鲁迅先生说他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”，这也难怪。但是，他附注中却说“要趁这机会，略说自己的经验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”云云，他的经验怎样呢？他说：  
  
　　我看中国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时（但除了印度）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  
  
　　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  
  
　　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  
  
　　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，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，不是“言”，只要是活的，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  
  
　　啊！的确，他的经验真巧妙，“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，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”这种经验，虽然钱能训要废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，却是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的经验了。  
  
　　唉！是的！“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，读外国书，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”，所谓“人生”，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？“欧化”的人生哩？抑“美化”的人生呢？尝听说：卖国贼们，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。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，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……事吗？  
  
　　哈哈！我知道了，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，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。不然，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？假使中国书僵死的，为什么老子，孔子，孟子，荀子辈，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？  
  
　　喂！鲁迅先生！你的经验……你自己的经验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，无以名之，名之曰：“偏见的经验”。  
  
　　十四，二，二十三。（自警官高等学校寄）

## 聊答“……”〔1〕

柯先生  
　　我对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，退让得够了。我那时的答话，就先不写在“必读书”栏，还要一则曰“若干”，再则曰“参考”，三则曰“或”，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。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，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。那时的聊说几句话，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，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。如先生者，倘不是“喂”的指名叫了我，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。  
  
　　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，你的所谓“……”，该是“卖国”。  
  
　　到我死掉为止，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，即使被卖，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，这是未来的事，我无须对你说废话。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：宋末，明末，送掉了国家的时候；清朝割台湾，旅顺等地〔3〕的时候，我都不在场；在场的也不如你所“尝听说”似的，“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”；达尔文〔4〕的书还未介绍，罗素〔5〕也还未来华，而“老子，孔子，孟子，荀子辈”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。钱能训〔6〕扶乩则有之，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，你虽然自以为“哈哈！我知道了”，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。  
  
　　你临末，又说对于我的经验，“真的百思不得其解”。那么，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了么？判决一取消，你的大作就只剩了几个“啊”“哈”“唉”“喂”了。这些声音，可以吓洋车夫，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，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。

## 奇哉！所谓鲁迅先生的话（熊以谦）

　　奇怪！真的奇怪！奇怪素负学者声名，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！鲁先生在《京报副刊》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：  
  
　　我看中国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书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  
  
　鲁先生！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，是你糟踏了中国书。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些甚么书？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——使先生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的书——是我们一班人所未读到的书。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，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样。鲁先生！无论古今中外，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，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；他所说的话，都是现世人生的话。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，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，决不会立万古不磨的说。后来的人读他的书，不懂他的文辞，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，若说他一定使你沉静，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，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，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，不解中国书。不懂就不懂，不解就不解，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，浅薄话呢？古人的书，贻留到现在的，无论是经，是史，是子，是集，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。舍了实人生，再没有话可说了。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。因为不同，说他对不对（？）是可以的，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。鲁先生！请问你，你是爱做小说的人，不管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，是浪漫的也好，是《狂人日记》也好，是《阿鼠传》也好，你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，你能说出一句话来吗？所以我读中国书，——外国书也一样，适与鲁先生相反。我以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，不应教青年都不读；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，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。  
  
　鲁迅先生又说：  
  
　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；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  
  
　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但是，鲁先生，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？不有活人，那里会有书？  
  
　既有书，书中的颓唐和厌世，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  
  
　难道外国的书，是活人的书，中国的书，是死人的书吗？  
  
　死人能著书吗？鲁先生！说得通吗？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，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。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。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，使他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。我想除了葛洪的《抱朴子》这类的书，像关于儒家的书，没有一本书，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。墨家不用说，积极入世的精神更显而易见。道家的学说以老子《道德经》及《庄子》为主，而这两部书更有它们积极的精神，入世的精神，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，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了。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，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！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“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”。但是果真领略到杨朱的精神，也会知道杨朱的精神是积极的，是入世的，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。我不便多引证了，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。我只要请教鲁先生！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，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，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  
  
　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！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！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：  
  
　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  
  
　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：  
  
　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，不是“言”。……  
  
　　鲁先生：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？古人已有“不学无术”的讥言。但古人做事，——即使做国家大事，——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，纵不从书本子上学，误事的地方还少。  
  
　时至今日，世界大变，人事大改，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，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，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。  
  
　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，犹恐行有不当，要从新估定，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，只要行，不要读书，那种行，明白点说，怕不是糊闹，就是横闯吧！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？这种青年，做代表，当主席是有余，要他拿出见解，揭明理由就见鬼了。  
  
　倡破坏，倡捣乱就有余，想他有什么建设，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。青年出了这种流弊，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，不加以挽救，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，因为要紧的是行，不是言。这种贻误青年的话，请鲁先生再少说吧！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“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”。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，没有教人做事的吗？鲁先生！我不必多说，请你自己想，你的说话通不通？  
  
　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，还教青年看外国书。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，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。读了外国书，再来做事，当然不是胸无点墨，不是不学无术。不过鲁先生要知道，一国有一国的国情，一国有一国的历史。你既是中国人，你既想替中国做事，那么，关于中国的书，还是请你要读吧！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，那么，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！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，欲做世界的文学家，那么，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！莫从大处希望，就把根本忘了吧！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，要读中国书，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。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，要读中国书，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。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，要入关来读汉文，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。日本要灭朝鲜，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。英国要灭印度，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。好了，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，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，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，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，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，只多读外国书，不过几年，所有青年，字只能认外国的字，书只能读外国的书，文只能作外国的文，话只能说外国的话，推到极点，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，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，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，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，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，你不称我们大日本，就会称我们大美国，否则就大英国，大德国，大意国的大起来，这还不光荣吗，不做弱国的百姓，做强国的百姓！？  
  
　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：鲁先生既说“从来没有留心过”，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？既说了这种话，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，公诸大家评论，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？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？

## 报《奇哉所谓……》〔1〕

有所谓熊先生者，以似论似信的口吻，惊怪我的“浅薄无知识”和佩服我的胆量。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。现在只能略答几句。

一、中国书都是好的，说不好即不懂；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。讲《易经》〔2〕的就多用这方法：“易”，是玄妙的，你以为非者，就因为你不懂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，和熊先生比赛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。但于你所举的几种，也曾略略一翻，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，例如我所见的《抱朴子》〔3〕外篇，就不专论神仙的。杨朱〔4〕的著作我未见；《列子》〔5〕就有假托的嫌疑，而况他所称引。我自愧浅薄，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。

二、“行要学来辅助”，我知道的。但我说：要学，须多读外国书。“只要行，不要读书”，是你的改本，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，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。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，当主席，否则就是“出锋头”。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〔6〕者，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？

三、我说，“多看外国书”，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，变成外国人了。你是熟精古书的，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，并且变了古人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？你也自己想想去。

我希望你一想就通，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。

四、你所谓“五胡中国化……满人读汉文，现在都读成汉人了”这些话，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。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，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，——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“积极”。我或者“把根本忘了”也难说，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，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〔7〕以至满洲入关那样，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“同化”！假使我们还要依据“根本”的老例，那么，大日本进来，被汉人同化，不中用了，大美国进来，被汉人同化，又不中用了……以至黑种红种进来，都被汉人同化，都不中用了。此后没有人再进来，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，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。这是怎样的美谈！

五、即如大作所说，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，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。汉人总是汉人，独立的时候是国民，覆亡之后就是“亡国奴”，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。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，不在语言文字的。美国用英文，并非英国的隶属；瑞士用德法文，也不被两国所瓜分；比国用法文，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。满洲人是“读汉文”的，但革命以前，是我们的征服者，以后，即五族共和〔8〕，和我们共存同在，何尝变了汉人。但正因为“读汉文”，传染上了“僵尸的乐观”，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，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，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，使他同化了。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，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？

大作又说我“大声急呼”之后，不过几年，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。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。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，不必说一切青年，便是在学校的学生，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？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，何以就“只能爱外国的国”？蔡松坡反对袁世凯〔9〕，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？满人入关，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，爱了他们之故么？清末革命，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，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？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，谈什么光荣，估什么价值。

六、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，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，照例是应该感谢的。我虽不学无术，而于相传“处于才与不才之间”〔10〕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，也还不无所知，但我不愿意照办。所谓“素负学者声名”，“站在中国青年前面”这些荣名，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，现在既然觉得“浅薄无知识”了，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。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，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。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，是不对的，我还活着，不像杨朱墨翟〔11〕们的死无对证，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。我也没有做什么《阿鼠传》，只做过一篇《阿Ｑ正传》。

到这里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：“既说‘从来没有留心过’”者，指“青年必读书”，写在本栏内；“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”者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，写在“附记”内。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，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。而且，也不待你们论定。纵使论定，不过空言，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，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，至多不过是“中虽有坏的，而亦有好的；西虽有好的，而亦有坏的”之类的微温说而已。我虽至愚，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？

临末，我还要“果决地”说几句：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，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，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，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。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，孔子〔12〕也还要更加崇奉，像元朝和清朝一样。

## 父亲的病

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。听说中国的孝子们，一到将要“罪孽深重祸延父母”的时候，就买几斤人参，煎汤灌下去，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，即使半天也好。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：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，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。——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。

父亲的喘气颇长久，连我也听得很吃力，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。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：“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……。”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，就是犯了罪；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，我很爱我的父亲。便是现在，也还是这样想。

早晨，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。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，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。于是给他换衣服；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《高王经》烧成灰，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……。  
　　“叫呀，你父亲要断气了。快叫呀！”衍太太说。  
　　“父亲！父亲！”我就叫起来。  
　　“大声！他听不见。还不快叫？！”  
　　“父亲！父亲！！”  
　　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，忽然紧张了，将眼微微一睁，仿佛有一些苦痛。

“叫呀！快叫呀！”她催促说。  
　　“父亲！！”  
　　“什么呢？……。不要嚷……。不……。”他低低地说，又较急地喘着气，好一会，这才复了原状，平静下去了。  
　　“父亲！！”我还叫他，一直到他咽了气。  
　　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，每听到时，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。

## 二十四孝图

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细的《儿童世界》之类，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，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。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，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，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。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，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，就要被塾师，就是当时的“引导青年的前辈”禁止，呵斥，甚而至于打手心。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“人之初性本善”读得要枯燥而死了，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，看那题着“文星高照”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，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。昨天看这个，今天也看这个，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。

…

到“卧冰求鲤”，可就有性命之虞了。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，严冬中，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，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，躺上去，也一定哗喇一声，冰破落水，鲤鱼还不及游过来。自然，必须不顾性命，这才孝感神明，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，但那时我还小，实在不明白这些。

…

至于玩着“摇咕咚”的郭巨的儿子，却实在值得同情。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，高高兴兴地笑着；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，要将他埋掉了。说明云，“汉郭巨家贫，有子三岁，母尝减食与之。巨谓妻曰，贫乏不能供母，子又分母之食。盍埋此子？”但是刘向《孝子传》所说，却又有些不同：巨家是富的，他都给了两弟；孩子是才生的，并没有到三岁。结末又大略相象了，“及掘坑二尺，得黄金一釜，上云：天赐郭巨，官不得取，民不得夺！”  
  
　　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，待到掘出黄金一釜，这才觉得轻松。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，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。家境正在坏下去，常听到父母愁柴米；祖母又老了，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，那么，该埋的不正是我么？如果一丝不走样，也掘出一釜黄金来，那自然是如天之福，但是，那时我虽然年纪小，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。

# 春秋与春秋笔法

## 名词解释：春秋、春秋笔法

《春秋》本指先秦时代各国的编年体史书，但后世不传，现在通常指唯一留存至今的鲁国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之史书重新修订而成，记述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间二百四十二年之历史，后人把书中包括之时代称为“春秋时代”。

孔子于公元前480年左右编纂《春秋》。孔子在记述历史时，暗含褒贬。到后世别人写“春秋三传”（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）三种注释书，将本来仅是年表之《春秋》所传达之各种事件，加上“此人行为正确”、“此人结果不当，是不好的”等严格批判，决定善恶。

春秋笔法，又称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，指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，但是却透过细节描写，修辞手法（例如词汇的选取）和材料的筛选，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。当下，春秋笔法则指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。

然后，由于孟子曰“孔子成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”，“春秋笔法”一语便开始有“谁是极恶之人，或是尊敬朝廷，由后世人们严格查定”之意思。这种做法称为微言大义或者春秋笔法，受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。宋欧阳修组织编修的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大量运用春秋笔法。

春秋笔法运用中较知名的有一字寓褒贬。如三个表示杀的动词：杀、弑、诛，其实各有深层含义。杀指无罪而杀，弑指以下犯上，诛则指有罪、有理而杀。

## 春秋原文

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年 | 四季 | 月 | 日 | 记事 |  |
| 元年 | 春 | 王正月 |  |  |  |
|  |  | 三月 |  | 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|  |
|  | 夏 | 五月 |  | 郑伯克段于鄢 |  |
|  | 秋 | 七月 |  |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|  |
|  |  | 九月 |  | 及宋人盟于宿 |  |
|  | 冬 | 十有二月 |  | 祭伯来 | （祭伯这个人来访） |
|  |  |  |  | 公子益师卒 | （公子益师去世） |
| 二年 | 春 |  |  | 公会戎于潜 |  |
|  | 夏 | 五月 |  | 莒人入向 |  |
|  |  |  |  | 无骇帅师入极 | （无骇帅军攻入极） |
|  | 秋 | 八月 | 庚辰 | 公及戎盟于唐 |  |
|  |  | 九月 |  | 纪裂𦈡来逆女 |  |
|  | 冬 | 十月 |  | 伯姬归于纪 | （鲁国女公子伯姬出嫁纪国） |
|  |  |  |  |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|  |
|  |  | 十有二月 | 乙卯 | 夫人子氏薨 | （国君夫人子氏逝世） |
|  |  |  |  | 郑人伐卫 | （郑国讨伐卫国） |

## 郑伯克段于鄢

### ——春秋原文只有一句：“夏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”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佗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祭仲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？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。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廪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。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，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。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。请以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(泄泄 一作：洩洩)

君子曰：“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其是之谓乎？”

## 翻译：

从前，郑武公从申国娶了妻子，叫武姜，她生下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，武姜受到惊吓，因此给他取名叫“寤生”，所以很厌恶他。武姜偏爱共叔段，想立共叔段为太子。多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都不答应。

到庄公即位的时候，武姜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。庄公说：“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，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，我都可以照吩咐办。”武姜便请求封给太叔京邑，庄公答应了，让他住在那里，称他为京城太叔。大夫祭仲说：“城邑的围墙超过了三百丈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。按先王的规定，大城市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城墙的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能超过五分之一。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的京邑，大小不合法度。违反了先王的制度，这会使您无法控制。”庄公回答说：“姜氏要这么做，我怎能避开这祸害呢？”祭仲说道：“姜氏有什么可满足呢？不如趁早给太叔另外安排个容易控制的地方，不让他的势力进一步蔓延。如果蔓延开来，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滋长的野草都很难除掉，更何况您尊宠的兄弟呢？”庄公说：“多做不义的事情，必定会自己垮台，你姑且等着瞧吧。

没过多久太叔又命令原属郑国西部、北部的边邑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庄公。公子吕说：“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，现在您打算怎么办？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，那么我就去服侍他；如果不给，那么就请除掉他，不要使民生二心。”庄公说：“不用除掉他，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。”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，一直扩展到廪延。公子吕说：“可以行动了！土地扩大了，他将得到民心。”庄公说：“像共叔段这样不亲近兄长，百姓就对他不亲，势力再雄厚，也将会崩溃。”

太叔修治城廓，聚集百姓，修整盔甲武器，准备好兵马战车，将要偷袭郑国国都“新郑”。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。庄公探听到这件事的时候，说：“可以出击了！”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，去讨伐京邑。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，共叔段于是逃到鄢城。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共叔段逃到共国。

《春秋》记载道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，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；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，所以用“克”字；称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；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，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，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。

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，并且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（不到死后埋在地下），不再见面！”过了些时候，庄公又后悔了。有个叫颍考叔的，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，听到这件事，就把贡品献给郑庄公。庄公赐给他饭食。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，把肉留着。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。颍考叔答道：“小人的母亲，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，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，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可以孝敬，唉，唯独我就没有！”颍考叔说：“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，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。颍考叔答道：“您担心什么呢？只要挖一条地道，挖出了泉水，从地道中相见，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？”庄公依了他的话。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，赋诗道：“大隧之中相见啊，多么和乐相得啊！”武姜走出地道，赋诗道：“大隧之外相见啊，多么舒畅快乐啊！”从此，他们恢复了从前的母子关系。

说：“颍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，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，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伯身上。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篇说：‘孝子不断地推行孝道，永远能感化你的同类。’大概就是对颍考叔这类纯孝而说的吧？”

《左传》(左丘明)认为，“郑伯克段于鄢”中，共叔段超越了一个做弟弟的本分，所以称段而不是弟。而郑庄公则没有完成教导弟弟应尽的责任，并故意放任共叔段，以期其走上造反的道路，所以称之为郑伯而不是兄。而共叔段后来的行为如同另一个国君，所以郑庄公平定共叔段，要用打赢敌国采用的“克”字。而最后，共叔段出逃却不说，则是史官也不好下笔来写此件事。

## 对春秋的评论

《春秋》一书的体例宛若各年月的新闻标题汇编，意不在史而在“义”。辜鸿铭之《中国人的精神》所陈即此。

相反地，《宋史》记载北宋王安石批评《春秋》为“断烂朝报”（朝廷公报的断简残篇）。

## 学术界对于《春秋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。

胡适认为：“《春秋》那部书，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，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。后来的史家把《春秋》当作作史的模范，便大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‘说真话，记实事’。《春秋》的宗旨，不在记实事，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。”

徐复观也说：“可以断定孔子修《春秋》的动机、目的，不在今日所谓‘史学’，而是发挥古代良史，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。可以说，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，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。”

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《春秋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。杜预在《春秋左传集解·序》中说：“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，考其真伪，而志其典礼，上以遵周公之遗制，下以明将来之法。”朱熹说：“圣人作《春秋》，不过直书其事，善恶自见。”——睁眼说瞎话

李敖曾评论孔子在《春秋》中做了许多手脚，“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，在《春秋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，鲁国的皇帝，四个在国内被杀，一个被赶跑，一个在国外被杀，这样六件重大的事，孔夫子竟在《春秋》里，一个字也不提。这哪里是写真相呢？这不是有意说谎吗？”[21]

## “春秋笔法”和“微言大义”

优点：汉语短诗歌比其他文化发达

### “春秋笔法”的弊端

“春秋笔法”强调通过简洁含蓄的文字来表达深刻的褒贬寓意。其核心在于“一字寓褒贬”，通过字词的选择、语气的轻重，乃至某些事件的省略或详述，来体现作者的立场和判断。

然而，这种笔法也带来了以下问题：

过度解读与歧义性： “微言大义”的追求使得文本的真实意图往往隐藏在字里行间，这极易导致过度解读。后人为了探寻所谓的“大义”，可能会将作者本无此意的细节附会出复杂的含义，从而偏离历史真相。同时，这种含蓄也带来了巨大的歧义空间，不同读者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理解，使得文本的权威性受到挑战。

牺牲叙事清晰度： 为了追求“微言”，作者有时会牺牲叙事的清晰度和完整性。事件的来龙去脉、人物的动机行为可能被刻意模糊或省略，导致读者难以全面理解历史事件的全貌。这与现代史学追求的客观、详尽、可验证的原则背道而驰。

主观性过强，缺乏透明度： “春秋笔法”的褒贬往往是作者个人主观判断的体现，而非基于充分的事实论证。读者难以辨识哪些是客观叙述，哪些是作者的春秋褒贬，从而难以形成独立判断。这种缺乏透明度的评价方式，使得历史叙述更像是一种带有强烈倾向的道德训诫，而非纯粹的史实记录。

限制言论与思想： 在某种程度上，“春秋笔法”也限制了直接、坦诚的表达。为了避免直言冒犯或触犯禁忌，作者不得不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。长此以往，可能会形成一种压抑的言论氛围，不利于思想的自由交流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。

### 批评“春秋笔法”与“微言大义”

“春秋笔法”和“微言大义”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，固然有其精妙之处，但也存在显著的局限性，甚至可能导致负面影响。

### “春秋笔法”

用删减和暗示来“裁判是非”

基本定义： “春秋笔法”指的是通过字词的微妙选择或省略，用看似客观的记叙来表达强烈的褒贬态度，以孔子“修春秋”时的写法为代表。

批评一：暗示代替论证，是非由笔者一人裁定

这种笔法建立在“我说了算”的基础上，谁是忠谁是奸，全靠用词轻重，比如“弑”还是“杀”、“入”还是“侵”。没有公开论证，没有证据链，甚至没有提供多个视角，就是一个人把复杂问题轻描淡写定性。

比如《春秋》写“齐侯伐我北鄙”，显得齐国无理进攻；但如果写“齐侯侵我北鄙”，语气就更重；再如果写“齐侯入我北鄙”，可能还表示对方是来巡逻的。这种极简词汇决定历史评价，近乎武断。

批评二：压抑批评和表达空间，制造“看懂才算聪明”的文化

这种做法助长了“字里行间读人心”的思维模式，把表达变成隐语和猜谜，让清晰、透明的表达变得低级甚至危险。

在今天，很多人用“春秋笔法”来自豪，认为说话绕弯子、留白含蓄就是高级，实则是回避责任、压抑讨论的懒政文风。

批评三：为权力服务的表达形式

“春秋笔法”既然是“圣人立法”，那它的褒贬就成了正统权威。谁被骂、谁被夸，哪怕当事人有冤屈，也无法申辩。

过度解读与歧义性： “微言大义”的追求使得文本的真实意图往往隐藏在字里行间，这极易导致过度解读。后人为了探寻所谓的“大义”，可能会将作者本无此意的细节附会出复杂的含义，从而偏离历史真相。同时，这种含蓄也带来了巨大的歧义空间，不同读者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理解，使得文本的权威性受到挑战。

牺牲叙事清晰度： 为了追求“微言”，作者有时会牺牲叙事的清晰度和完整性。事件的来龙去脉、人物的动机行为可能被刻意模糊或省略，导致读者难以全面理解历史事件的全貌。这与现代史学追求的客观、详尽、可验证的原则背道而驰。

主观性过强，缺乏透明度： “春秋笔法”的褒贬往往是作者个人主观判断的体现，而非基于充分的事实论证。读者难以辨识哪些是客观叙述，哪些是作者的春秋褒贬，从而难以形成独立判断。这种缺乏透明度的评价方式，使得历史叙述更像是一种带有强烈倾向的道德训诫，而非纯粹的史实记录。

限制言论与思想： 在某种程度上，“春秋笔法”也限制了直接、坦诚的表达。为了避免直言冒犯或触犯禁忌，作者不得不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。长此以往，可能会形成一种压抑的言论氛围，不利于思想的自由交流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。

### “微言大义”

用含糊之词包装意识形态

基本定义： “微言大义”指的是用简约语言承载复杂、深刻甚至高尚的道德或政治判断，是儒家对《春秋》等经典的解释方法。

批评一：用不明确的语言制造道德负担

“微言大义”让一句模糊话语背负巨大的道德或政治意涵，从而在诠释中制造“你不懂就不道德”的权力机制。

比如一句“齐桓公尊王攘夷”，就要解读成“恢复周室正统、合乎天命”。谁不接受这种解读，就是不忠、无德、逆天。

批评二：鼓励故作高深，话语权掌握在解释者手里

“微言大义”产生了一整套“读经解义”的特权阶层，他们垄断了文本的解释权，对大众话语构成压制。

简单的故事非要解释成忠孝仁义，复杂的问题反而没法讲清楚。最后变成“只准我解读，不许你质疑”的道德绑架工具。

批评三：脱离现实、漠视具体问题

将复杂社会问题概括为“义”或“仁”等抽象词，反而回避了具体解决方案。宏大叙事背后是行动瘫痪。

“微言大义”是“春秋笔法”所追求的目标，指在精炼的言辞中蕴含深远而重大的意义。但其实现过程和结果也常陷入困境：

神秘化与精英化： “微言大义”往往被少数“精通”其道的人所掌握和解释，从而导致知识的神秘化和精英化。普通读者难以领会其中的深意，使得文本的传播和理解受限。这种解释权的垄断，也可能被滥用，成为维护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或权威的工具。

脱离实际的空泛化： 为了追求“大义”，有时会将简单的事件或言论拔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，使其脱离具体语境而变得空泛。这种“大义”往往流于道德说教或政治训诫，而非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。

成为曲解的借口： “微言大义”的模糊性也可能被恶意利用，成为曲解原意的借口。为了迎合某种需要或观点，人们可以从看似“微言”中“解读”出符合自身利益的“大义”，从而扭曲文本的真实含义。

阻碍直接有效的沟通： 在现代社会，强调直接、清晰、有效的沟通。过分追求“微言大义”反而会增加沟通成本，造成误解。尤其在需要准确传达信息、明确指令的场合，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是低效且危险的。

# 外儒内法

外儒内法是一种中国从汉代到清代长时间内[国家政权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6%94%BF%E6%9D%83/1869289?fromModule=lemma_inlink)实行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。即表面上推崇[儒家思想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4%92%E5%AE%B6%E6%80%9D%E6%83%B3/74212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)，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。

外儒，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；内法，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血腥的后盾。外儒内法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。

也有人说儒家本来就是“表面上温和，实际上残忍”。所谓“外儒内法”，本来就是儒家的基本特点。

## 厚黑学

# 儒家

### 《论语译注》

# 法家

## 荀子——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

## 《商君书》

商鞅（前390年—前338年），又称卫鞅或公孙鞅 商鞅及其变法对法家影响深远，《[商君书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5%86%E5%90%9B%E4%B9%A6)》汇编其思想和言行

**作法自毙**

前338年，秦孝公病危，《[战国策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88%98%E5%9B%BD%E7%AD%96)》记载秦孝公想传位于商鞅，商鞅推辞不接受。赵良警告的五个月后，秦孝公去世，其子[秦惠文君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A7%A6%E6%83%A0%E6%96%87%E7%8E%8B)继位。商鞅想要告老退休，有人向秦惠文君说：“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社稷，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。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，而不知道君上您。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，愿君上早下决断。”[[105]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5%86%E9%9E%85#cite_note-114)公子虔等人也告发商鞅谋反，秦惠文君于是派人捉拿商鞅。商鞅逃至边关，晚上想住宿旅店，因未带身份证件，店主不知道是商鞅本人，害怕新法连坐而不敢留宿。商鞅感叹道：“制定的法律竟然遗害到了这种地步！”这就是成语“作法自毙”的来历。

商鞅带领亲属及手下随从逃亡至魏国，魏将[穰疵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7%A9%B0%E7%96%B5&action=edit&redlink=1)怨恨商鞅用欺骗的手段俘虏公子卬、击败魏军，将其驱逐回秦国。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地，发动邑兵攻打[郑县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83%91%E5%8E%BF_(%E7%A7%A6%E5%9B%BD))（今陕西省[华县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D%8E%E5%8E%BF)）。秦惠文君派兵攻打，商鞅战败死于彤地，其尸身被带回咸阳，处以[车裂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BB%8A%E8%A3%82)后示众。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族。商鞅死后，他所推行的新法并没有被废除，而是一直影响着秦国乃至以后的[秦朝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A7%A6%E6%9C%9D)。

## 法家和法治的区别

简而言之，在法家眼里，法律是君主的工具之一，也就是还有其他工具，比如罚酒三杯，法治则是人人在法律之下。

**法家**：法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种哲学流派，强调以严苛的法律、严明的赏罚和集中的权力来治理国家。法家主张“以法治国”，但其核心是统治者利用法律作为工具来维护统治、巩固权力，强调“法、术、势”结合，法律服务于君主权威。

**法治**：法治（rule of law）是现代法律理念，指法律至上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应遵循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旨在保护公民权利、限制权力滥用。法治强调法律的独立性和普遍适用性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